

# 经济学家骇人语录距平民百姓有多远

近日,网上盛传一篇题为《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》的文章,文中收录了如厉以宁、张曙光、张维迎、郎咸平等17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。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些说辞的确让人难以理解,如“房价涨得快是好事”、“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”、“腐败是改革的成本”等。(1月8日《新快报》)

## 【江南都市报一评】

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言论,开始时大家还是信的,因为那时专家还不多,大家也不太懂“高深的经济问题”。后来,“中国经济学家”之所以沦为揶揄人的头衔,全拜中国阴暗难料的股市和楼市所赐。因为老百姓们发现,在听信了那些头上顶着光环、周身透着高级知识分子气息的经济学家们忽悠后,损失的全是真金白银,那可是浸透着血和汗、梦想靠它发家致富的家底钱!

比如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宣称:“保守地说,今后10年,中国的大城市,无论是上海、北京还是南京,房价要涨3倍;大胆地说,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。”那些在高价位买房,或者因房价节节上涨而买不起房的市民,当然要怪罪王先生。

“在公有制下,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;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,调动官员的积极性。”这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的高论。俺们也许搞不懂帕累托次优点的现实意义,但你张先生分明在说腐败有好处,为当前的腐败作学术辩解,那大家不把你视作“腐儒”才怪。

事实上,某些大牌经济学家行为惊世骇俗,言论愤世嫉俗,以致颇有行为艺术的风范。让俺等升斗小民,闻之讶然不解,观之莫衷惊诧。笔者猜想,专家们应该是这般居高临下的心态:真理总是被少数人所掌握。你们大家听不懂我的真理,那是你们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我的运行速度,知识水平只够勉为其难地看懂K线图。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,我老先生做的是高深莫测的大学问,引车卖浆之流当然不会懂。

↓良心迷失造就经济学家骇人语录 江南都市报 1月9日 作者 吴志刚

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这是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价值要求。你实在做不来,我们也不强求。但如果你把知识分子的良心让狗吃了,要不依附权贵阶层,发布言不由衷为权贵牟利的言论;要不多了世故的圆滑,少了正义的冲动,变成了犬儒乱说乱叫。那就是斯文扫地,人格丧失。

如果任凭天道蒙尘的情况大批发生,知识分子逐步失去“天道救世”的信仰,整个国家缺乏必要的警醒者和锐利的斗士,那祸害就不止耽于眼前。今后中国数十年的发展,都有可能因误入歧途而招致惩罚。

## 【快报再评】

对于经济学家的批评文章已车载斗量,本人基本同意批驳者的观点,比如说有些经济学家“精英”意识特强,民

主意识甚弱,把群众当愚民,有些人发表了为贪腐张目的奇谈怪论。但是这里我想特别指出:一,不要一竿子把经济学家全扫下水,他们中也有吴敬琏、党国英等有“良心”的,并不想从特殊利益集团那里分一杯羹;二,经济学家通常更重效率,而不像社会学家更重公平,这是学科特点使然,而经济学家长期拥有话语霸权错不在他们,社会学法学等领域专家谁不想拥有,因此我们应该问是谁宠了、为何宠他们?三,经济学家也是人,包括吴敬琏也会说错话,比如他说火车票就该提价,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难免脱离普罗大众,而不是良心坏了;四,任何人的话都是有一定上下文语境的,经不起断章取义,而本文所批有些话,说者的本意可能是另一种情形,我们要与人为善地批驳,骂人是骂不倒的。

## 公民眼里没有衙门

↓你家在市委有没有人 中国青年报 1月9日 作者 李辉

河南省汝州市温泉镇连疙瘩村村民鲁伟政在去浇地途中,疑被路旁突然倒下的电话线杆砸死,死者家属与网通汝州分公司协商未果,网通工作人员竟然说“你家在市委没人,有人的话就赔钱多了”。(大河网1月7日)

## 【中国青年报一评】

那位网通工作人员口中的“市委”,只是一个泛指而已。将“市委”替换成其他的公权力机构,一样符合其“赔偿标准”。

当地的党委政府及其工作人员,未必把自己当做“衙门”、“老爷”,然而,那个网通工作人员不仅从心底里把他们当做“人上人”,连他们的家人,都顺理成章地可以享受非一般人的待遇。为什么?根源还是在“权力”上,如果说权力把权力的拥有者变成了不同于普通人的人,这种权力是有缺陷的;如果说权力的拥有者不愿意自己去修补权力的这种缺陷,权力的约束机制是不到位的。

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中的书商范大娘那句经典台词“我上面有人”,因其源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,我们并不觉得突兀。前不久深圳海事局的林嘉祥口吐狂言:“(我的)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,敢跟我斗,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!”此话导致民意沸腾,在谴责狂言之时,人们在反思——咱们老百姓,又是一种怎样的“级别”?

本来,所有的公权力机关,都应该是老百姓的“家”。而要说“级别”,人民的“级别”应该最高。可是,当权力不自律的时候,当对权力的约束不到位的时候,老百姓想当“家里人”并不容易。

“你家在市委有没有人”成了“赔偿标准”,不知道当地市委是否觉得有些窝火——平白无故扯上我干什么?其实,所有公权力机关都应该反思,出现这种事情,这种话语,其实跟你并非无关。

## 【快报再评】

“你家在市委有没有人”,这句“看来头,比后台”、“看人下菜碟”的话,是大实话。深圳海事局那个林嘉祥说“你们算个屁”时,也是大实话,但是“酒后吐真言”,意在仗势欺人;而网通这个工作人员,看来是真心窝心的话——虽然这是一句与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很不协调的描述。

公民社会、法治社会讲的是人人平等,旧社会才是论权力大小将人分为三六九等。我们现在不少地方不少人像公民,倒像家臣像奴才,这是很可悲的。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再也不是某个某些强国大国的附庸,我希望在国内,也不会有人成为另外一些人的附庸。一个没有人身依附关系、不靠“搞关系”维权的公民社会,才是正常的社会。

# 公款寻亲不妨“人肉搜索”

都有谁在内乡做过知县?他们的后人现在又在何方?河南内乡县县长全李明策划了一场特殊的“寻亲”活动,希望能与232位“前任”的后裔面对面。(《东方今报》1月6日)

## 【中国青年报一评】

这个活动很是红火,内乡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,知县后裔可向内乡县政府捐赠知县的有关资料,内乡县政府再根据情况按相关政策予以现金奖励,知县后裔享受景区内景区免费的优惠措施。内乡县政府将在适当时机举办“内乡县衙知县后裔祭祖”活动和专题文艺晚会,还将筹备举办“内乡县衙知县后裔专题展览”,并出版《内乡知县后裔名录》。

对此,我首先关注的是,这要花多少钱?从报道中看,明显需要花钱的就有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、对知县后裔进行奖励、举办文艺晚会和祭祖活动、筹办知县后裔专题展览、出版知县后裔名录等。但从元朝至今七百多年过去,232位知县的后裔可能已经繁衍到非常之多,对大量不知真假的知县后裔进行甄别鉴定,就是一

个非常费时耗力的工作。

而当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知县后裔们赶来参加活动时,路费食宿又将是怎样巨大的支出?举办这样一个活动,再保守也得数百万投入吧?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县级政府,拿出这么多钱搞这样的活动有必要吗?

政府本质上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,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。历史上的县太爷的后裔们是谁,与公共利益有什么关系?当地老百姓谁关心这样的问题?谁愿意为了弄清这些而花出不菲的款项?如果让老百姓投票,我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同意把大笔的金钱投在这些不急之需上。甚至可以说,专门为该县从古至今的县长们的后裔搞这样的活动,是在张扬官本位、特权论、血统论,政府拿公共财政去张扬这样落后而腐朽的价值观,是非常不合时宜的。

可以想象,河南内乡县历

史上的232位县太爷,虽有某些奋发有为、造福地方的清官,但肯定也有尸位素餐、鱼肉百姓、搜刮地皮的庸官贪官。对清官进行一些纪念或许还有必要,而花钱纪念贪官庸官就沦为滑稽。

对于官员后裔来说,更无“众里寻她千百度”予以特殊优待的必要。在民间,有人愿意掏钱为某些历史上的官员的后裔树碑立传,那是他们的私事,而政府成立专门机构、兴师动众地将他们特意从人群中挑选出来,给予优待和礼遇,给人感觉是政府对待民众是以出身论英雄、以出身画圈子。内乡县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一种十分错误的价值导向,在利用政府的影响力抬高官员及其后裔的地位的同时,贬抑了大众的地位,挫伤了他们的心灵。

寻找知县后裔这个被一些人称赞为很巧妙的“点子”,开了一些地方政府哗众取宠的又一恶劣先例。如果各级政府部门把所有古代官员的后裔们召集起来搞活动、树碑立传,那祖上找不出官的小小百姓怎么活,还真成了一个难题。

一恶劣先例。如果各级政府部门把所有古代官员的后裔们召集起来搞活动、树碑立传,那祖上找不出官的小小百姓怎么活,还真成了一个难题。

## 【快报再评】

我很敬佩该县官员为发展特色旅游呕心沥血的精神,不过他们专门搞这样的活动,的确是张扬官本位、特权论、血统论等腐朽的价值观,不合时宜。说他们太有才了也好,说他们太笨了也好,可以理解的是,人总是从自身的体验和愿望出发想问题的,因此,只能说这些官员太有权了,想出一个馊主意,就可以用公款去变成现实。稍有文化的人,谁都知道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、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些格言警句,哪愿意花这冤枉钱找什么历任知县后裔?但是,若非用公款,谁爱这么折腾,用自己的精力和金钱发动“人肉搜索”,亦无可不可吧?

# 死于春运的老伯不能白死

7日凌晨,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发生一起悲剧,一位老伯通宵排队买票,猝死在售票大厅。杭州铁路公安处证实了此事,但没有透露死者身份等其他信息。(钱江晚报 1月9日)

## 【潇湘晨报一评】

2005年的元旦,一位在福建省龙岩市做工的湖南籍男子左家兵,喝了5两白酒一觉睡去,送至医院已回天乏术,老乡李绍为只得带上醉死他乡的左家兵,乘K298列车踏上归乡之路,最后在广州流花火车站被发觉。后来,这段传奇被那位常在春晚表演“农民式狡猾”的赵本山,拍成电影《落叶归根》。无名老伯之死,与左家兵同一路途,只少去了应用“农民式狡猾”的坎坷,一睡便成坦途,默生默死之间,同是天涯沦落人。

无意指责春运什么,不就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么,谁要用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,必须用这样长的路途承载劳动力的转移与生活希望的潮起潮落呢?然而,恰恰是在一个13亿人最喜悦的团聚时刻,要用

那么多悲剧去分担。

我们还记得,去年1月13日,春运第一天,人员爆满的5082次列车驶入安徽芜湖火车站,因担心上不了车,一号站台人群向还未停稳的列车涌过去,安徽师范大学大三女生冷静被挤下站台,在正滑行的车轮之下,一朵生命之花凋谢在长长的铁轨上,而属于她的铁轨,是一支香烟的长度——据统计,中国的人均铁路长度是57毫米,而每年春运,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,事后,媒体报道,事发当天铁路部门给芜湖站出售5082次车票额定量为40张,实际售票量为484张。

十数年的春运,运送了太多的愿望,也有太多的欠账,所有的激烈与无奈,所有的挣扎与改变,都被悲剧放大并表现出来。这个社会最广泛的人群,被放在狭小的空间内,为

各自的幸福与各自的团聚而奋斗,那么在车厢之外,又有谁在为他们的幸福与平等而奋斗?

铁道部早就在说,要彻底解决春运买票难的问题,有待于发达的铁路网的建设,3至5年后中国铁路客运专线网可以初步建成,能基本解决中国铁路一票难求的局面。十数年的等待,已经造成了这许多悲剧,3至5年的等待又要多少悲剧来支撑呢?人们所希望的是,这个等待,能够快一点,这种等待,悲剧可以少一点。一年的活着,就是等待一张回家的车票,对于许多人来说,这张车票太重太重。这张薄薄车票,不应写满沉重、落满悲伤,即使是在目前铁路资源紧张的情况下,责任、荣誉与关爱以及能力的充分发掘,也能让这张车票承载更多的权利,这不是梦想,而是呼吁。

↓春运还需要多少通宵排队买票猝死的悲剧 潇湘晨报 1月9日 作者 晓宇

## 【快报再评】

首先,作者一再表明“无意指责春运什么”,更多表达的是哀伤和无奈。可是我想旗帜鲜明地批评又有什么不可?正如有的作者已愤慨地抨击的,分割中国城乡的户籍制度是无形的“柏林墙”,这是农民工必须返乡过节的总根源。举国上下都认识到了这一点,决心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,问题在慢慢迟速,我们要求尽快些。

其次,在现有运力条件下,为什么就不能实行铁路乘客实名制?是怕麻烦还是为了控制票源?再有,三五年后铁路修多了,就不挤了吗?现在北京的马路比香港新得多、宽得多、直得多,为什么北京堵车那么严重而香港公交车跑得飞快?管理和服务水平才是最重要的。